



新四军与老百姓的鱼水情

新四军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人民武装力量,被毛泽东赞誉为“华中人民的长城”。作为华中的子弟兵,造福人民、服务人民、关心人民是新四军情系于民的不变情结。无论战事多么频繁,新四军总是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积极为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在华中大地上留下了一段段解民忧惠民生的佳话,彰显着新四军深厚的为民情怀。

一道宋公堤 根治水患立丰碑

华中地区水网密布,老百姓经常遭受水患之灾,兴修水利成为新四军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1941年新四军第三师帮助盐阜人民修筑海堤阻海安澜的事迹便是其中的一个历史见证和生动缩影。

新四军第三师所在的苏北盐阜区地处黄海之滨,每到夏季台风来临就会遭遇海啸、海潮的侵袭,1939年的一场特大海啸更是给沿海民众带来巨大灾难。1940年10月,时任八路军第五纵队(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司令员黄克诚率领部队来到盐阜区,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老百姓对新政府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请求政府帮助修筑海堤。修筑海堤需要大量人力财力,面临重重困难。黄克诚明确指示:这是一件关系民生的大事,再难也要帮助群众修堤。1941年2月,修堤委员会成立,阜宁县县长宋乃德亲任修堤总指挥。为了击破敌伪散布的新四军筑堤是假、骗钱抽壮丁是真的谣言,宋乃德作出“修堤全部费用不用人民负担,以盐税作抵,发行100万元公债,由政府偿还”的承诺,不增加老百姓一分钱负担。

1941年5月,工程开工。当时正值青黄不接、粮食匮乏、灾民又多,工地上民工粮食一时难以供应,新四军第三师立刻将新采购的军粮及时运到工地,解了燃眉之急。工程施工中款项公开透明,民工工资按所做的土方数给价,每日公布于各工棚前。工地上军民齐上阵,黄克诚、张爱萍、曹荻秋、宋乃德等党政军领导人亲自到场参加劳动,政府工作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民工同在一个锅里吃饭,同在一个工

棚睡觉,广大民工十分感动,敌人谣言不攻自破。

经过军民共同努力、艰苦奋斗,一道90华里长的捍海大堤如期完工。竣工不久,牢固结实的新海堤即经受住了当年的海潮冲击,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老百姓万户欢腾,人人称赞共产党、新四军和以宋乃德为县长的抗日民主政府的功德,公议将此堤命名为“宋公堤”,以与宋朝名臣范仲淹修筑的“范公堤”相媲美,勒石立碑,永久纪念。著名作家阿英曾写《苏北伟大的水利工程建设——宋公堤》一文,纪念新四军在修堤中的伟大功绩。这条捍海长堤成为共产党和新四军为民造福的历史丰碑,至今在苏北沿海一带,广大人民群众还传颂着这样一首民谣:由南到北一条龙,不让咸潮到阜东。从此再无冲家祸,每逢潮声思宋公。

一场防疫战 驱除病魔聚民心

20世纪40年代,苏北地区流行一种现已绝迹的“黑热病”。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一旦感染此病,病人会迅速发高烧、流鼻血,皮肤发黑,日渐消瘦,肚子里还会长出一个大硬块。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病人将不治而亡,故此病又被老百姓称为“黑死病”。当时的苏北几乎村村有病人,甚至有的全家染病而死。

由于缺医少药,老百姓束手无策。黄克诚得知瘟疫肆虐的情形,命令师部医院抓紧想办法为群众驱除病魔。第三师卫生部部长吴之理和主任医师章央芬夫妇二人带领医务人员,冒着被传染的危险,积极投身于黑热病的防治工作,专门编写了有关黑热病传染途径、症状诊断、治疗预防的科

普宣传材料,在当地群众中广泛宣传,以便及早发现病情。为了培训医护人员,他们开办了黑热病专题轮训班、化验训练班、制剂培训班,普及诊断治疗知识。他们还自行研制蒸馏水、生理盐水和特效药三价锑制剂,以克服药品匮乏的困难。

得知新四军免费为老百姓治病,附近的患者纷纷前来求医。一个治疗过程需要一个月左右,病人越来越多。师部医院就借用民房开办了黑热病疗养所,二十多个医护人员分散住在附近老百姓家里,每人专门负责三五个病人;每天上午给病人喂药、观察病情,下午集中讨论和解决治疗中出现的疑难问题。当时,章央芬大夫的大儿子三岁,小儿子才几个月还在喂奶,她白天把孩子托付给村民帮忙照看,忙到天黑才顾不上接孩子回家睡觉,这种连轴转的工作节奏持续了数月之久。

一年多的时间,新四军治愈了上千名黑热病人,基本扑灭了疫情。许多治愈出院的群众以最质朴的方式——磕头,来表达他们内心的感恩之情。新四军医务人员不怕苦不怕累,冒着被传染的危险,全心全意为盐阜人民治疗黑热病的无私行为,感动了根据地的老百姓,从而也坚定了人民群众跟党走、信赖和拥护共产党的决心,在新四军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首《白菜心》唱出军民鱼水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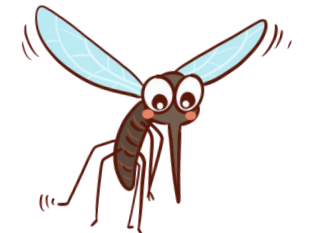
“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这是一首抗战时期在华中大地广为流传的歌谣,歌词以鲜嫩、好吃的白菜心比喻人民子弟兵,生动而又形象地表达了新四军和老百姓之间的鱼水深情。

新四军挺进华中之初,沦陷区民众的抗日信心极为低落,对这样一支武器简陋、兵力不足的部队是否能打仗是持怀疑态度的。新四军积极寻找战机,主动出击,用战斗的胜利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人民的胜利信心。1938年5月12日,新四军第四支队在安徽巢县以南蒋家河口伏击日军巢县守备队,初战告捷;6月17日,粟裕率先遣队在江苏镇江西南韦岗伏击日军汽车运输队,江南首战获胜……胜利喜讯传遍大江南北,广大民众群情振奋,新四军在人民心中的威望迅速提高。

为保护华中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新四军与装备精良的日伪军展开殊死较量,以无畏的勇气和顽强的斗志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奋勇杀敌。战斗间隙,新四军帮助老百姓垦荒种地、救灾抗疫,解决华中人民实际困难。为赢得华中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新四军颁布拥政爱民十大公约,严格建章立制,对广大指战员进行纪律教育;结合华中实际情况,把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修订为“三大纪律十项注意”“十项注意”中,第一条到第九条都是关于群众纪律的具体要求。

在事实教育下,华中人民改变了过去“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大批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唱着“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歌谣,告别父老乡亲投身抗日,成为新四军的一员。新四军也在华中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地成长壮大,从1937年成立之初的1万余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主力部队21万人,地方部队10万人,另有民兵96万人,成为华中敌后抗日的中流砥柱。

(据《学习时报》)



为与蚊子“作战” 古代有“驱蚊官”

古人想出各种驱蚊灭蚊之法,春秋时期还有君王甘当“喂蚊帝”

嗡嗡嗡嗡嗡嗡……啪!该死的蚊子!没有拍死它,反倒抽了自己一耳光。没有什么比夏天的蚊子更烦人了,这小小的蚊子不仅让现代人无奈,也让古人吃尽了苦头。被吵得睡不着觉的古人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在周朝时期有捉虫之官,古人不仅纷纷通过诗歌记录与蚊子的斗争,还想出各种驱蚊灭蚊之法。

周王室设立专职人员 烧莽草驱赶蚊虫

人类与蚊子战斗是贯穿几千年文明史的“大事件”。最早记载蚊子给人带来烦恼的应该是春秋时期的庄子:“蚊虻嚼肤,则通昔不寐矣。”让蚊子给咬得彻夜难眠,想必很多人对此都有体会。

不过,当时的周王室有办法来对付蚊子:设立专职人员,负责驱蚊。据《周礼》记载:“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禁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蛊之事。”这个翦氏专门为周王室驱蚊虫,周王可以安心睡大觉,只是苦了翦氏。“驱蚊官”在工作之前,仪式感得拉满,首先他们要向神灵祈祷,希望凭借神灵

的力量除掉蚊虫。接着,他们才算干正事——燃烧有毒的莽草驱赶蚊虫。

古代诗人对其口诛笔伐 也有人任其叮咬

自古以来,人们与蚊子的战斗没有停息过。古代文人们纷纷通过诗歌记录与蚊子的斗争。在他们的笔下,蚊子对人的骚扰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唐代诗人吴融《蚊子》一诗写道:“天下有蚊子,候夜嚼人肤。平望有蚊子,白昼来相屠。不避风与雨,群飞出菰蒲。扰抗蔽天黑,雷然随舳舻。利嘴入人肉,微形红且濡。振蓬亦不惧,至死贪膏腴。舟人敢停棹,陆者亦疾趋。南北百余里,畏之如虎驱。”不是与蚊子经历过百般缠斗,怎么能把蚊子写得这

么鲜活。

提到蚊帐,古代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诗人皮日休《蚊子》诗就写道:“隐隐聚若雷,嚼肤不知足。皇天若不平,微物教食肉。贫士无绛纱,忍苦卧茅屋。何事觅膏腴,腹无太仓粟。”夏日炎炎,没钱买蚊帐的贫穷百姓,只能默默忍受群蚊的攻击。

到了五代南唐时期,诗人杨奎干脆以开放的姿态迎接蚊子的夜餐:“白日苍蝇满饭盘,夜间蚊子又成团。每到夜深人静后,定来头上咬杨盔。”反正蚊子每夜都要来骚扰,就伸头任其叮咬吧,其豁达洒脱跃然纸上。

齐桓公甘当“喂蚊帝” 还悟出了治国之道

但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比如齐桓公,他对蚊子的感情要复杂得多,用“爱恨痴嗔”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

一个夏天,齐桓公在柏寝台躺着,与他一起躺的人还有管仲,于是他们开起了卧谈会。齐桓公忽然听见一阵“嗡嗡嗡”。齐桓公却对管仲说道:“仲父,现在咱们国富民强,没有什么太多的忧患。这会儿我听见蚊子嗡嗡嗡嗡乱转,它们是没吃饱么?啊,我好心疼这些蚊子哦!”只见齐桓公拉起蚊帐,将蚊子放了进来,他说:“就让它们来咬我吧!”

齐桓公分析:“这些蚊子,有的比较客气,没咬我就飞走了;有的最可恶,吸了一些血也飞走了;最容易的当属那些不知足的蚊子,肚子已经吃饱了,还舍不得飞走,最后肠子被撑破,只能当场毙命……”齐桓公下令,要求全国的老百姓们以那些贪婪的蚊子为鉴,杜绝奢侈,提倡勤俭节约。

这段故事被记载于南朝梁萧绎《金楼子》卷四“立言篇九”中,齐桓公因为心疼蚊子而自愿成为“喂蚊帝”,还悟出了治国之道。



吸蚊灯
山西慧光古灯博物馆。

古人驱蚊招数多

清代,蒲松龄饱受蚊虫之苦,漫漫长夜,正在撰写《聊斋志异》的他,苦于蚊子袭击,以切肤之痛写下了《驱蚊歌》:“夏蚊长喙毒于蝇,薄暮暗室如雷轰。摇身鼓翼呼其朋,翩然来集声嘤嘤。衾覆半体咽股肱,皮肉坟起爬痒松……炉中苍术杂烟荆,垃圾烧之烟飞腾……安得蝙蝠满天飞,一除毒族安群氓。”

蒲松龄不仅提倡用火攻熏蚊子,还建议人们利用蚊子的天敌蝙蝠来除蚊。被吵得睡不着觉的古人不会坐以待毙,想出了各种驱蚊灭蚊之法。

熏香 是古人对付蚊子最常用的方法。早在五千年前,人们就学会用“熏”的方法消灭害虫、祛味、给衣物增香,甚至已有专门的熏香用具。

汉代流行一种名为“博山炉”的熏香器具,因器型像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而得名。《博物志》记载,汉武帝时曾通过焚熏香以“避疫气”。

蚊帐 先秦时人们夏天已使用蚊帐防蚊,梁元帝萧绎《金楼子》中记载有齐桓公的话:“白鸟(蚊)营机而求饱,寡人因之开翠纱之帐,进蚊子焉。”

夏日炎炎没钱买蚊帐的贫穷百姓只能忍受蚊子的骚扰了。“二十四孝”中吴猛喂蚊孝父的故事,讲述孝子吴猛因为家贫没有蚊帐,为了让父亲不挨咬,所以脱光衣服让蚊子咬自己。

吸蚊灯 明清时发明的精巧实用的驱蚊灯,利用了热胀冷缩的原理,在灯的鼓肚上有一个喇叭形的大口,灯置其中,点燃后,气流从大口中进入,从上面的烟道排出,飞来的蚊虫就被吸入而烧死。

棕拂子 古人使用一种手持驱蚊工具“棕拂子”。它有柄可持,柄上扎有动物尾毛,或是棉、麻、棕长丝,唐宋以后民间多用易得的棕榈叶,俗称“棕拂子”。(据《厦门晚报》)

“铁脚板”俘虏敌炮艇

1949年4月20日夜至21日,第二、第三野战军在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配合下,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敌狼狽败退,我军乘胜追击。

大通镇地处安徽省铜陵县境内,作为长江南岸水路交通枢纽集镇,国民党军在此设立军用码头和仓库。第三野战军第21军第61师成功突破长江天险后,即命183团5连前往大通镇执行警戒任务,为后续渡江部队提供掩护。5连抵达大通镇后,立即占领码头,肃清残敌。

4月22日7时许,敌军1艘铁壳炮艇在上游被我炮兵击伤后,沿五步沟向大通镇驶来。5连哨兵发现后,立即向连队报告。连党支部研究决定迅速占领阵地,伏击敌舰。

5连将3排、2排和1排从左至右依次部署在惠中村江岸一线,隐蔽占领阵地。连属4具掷弹筒配置在1排阵地,所在营里配属的60毫米迫击炮和重机枪配置在2排阵地,均由连直接指挥,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8时许,未察觉危险的敌艇向我伏击区。5连指挥员沉着冷静,待敌艇完全进入伏击圈中心水域后,立即下令全连火力齐射。突如其来的攻击令敌军陷入混乱,纷纷躲进舱室。交战中,我军迫击炮击中敌艇艏部。当发现码头已被我军控制后,敌军只得驾驶受损炮艇慌忙逃窜。见状,副连长立刻率1排沿江追击,2排和3排紧随其后。

1排追至大通镇东边时,被一条宽60米、深8米的河流所阻。我军动员了一艘停泊在岸边的木船用于渡河。鉴于木船运力有限,为把握战机,部分水性娴熟的战士果断泅渡过河。

登岸后,官兵发现敌艇因艏部中弹下沉,行驶缓慢,立即加速追击。在大通镇以东约4里处,我军凭借“铁脚板”终于追上敌艇。冲在前面的1排率先越过敌艇,抢占有利阵地,以密集火力阻击敌艇前进。该排一名射手精准命中敌艇排气管,导致敌艇失衡向北倾斜,在江面失控打转。1排随即展开政治喊话,多数敌人军心动摇,唯艇长仍犹豫不决,驾驶炮艇继续缓慢东移。5连指挥员命令1排排长率9名水性好的战士实施武装泅渡。当突击队逼近至30米左右时,敌人突然开火顽抗。岸上的5连官兵立即以全部火力压制,掩护泅渡突击队。最终,走投无路的残敌缴械投降。此战,5连俘敌近40人,缴获1艘铁壳炮艇、2门机关炮、11挺轻重机枪及一批弹药。战后,5连被授予“一等战功连”称号。

(据《中国国防报》)

为什么古代铜钱大多是孔方兄

钱币,在古代被亲切地称为“孔方兄”。这一别称源于《鲁褒传·钱神论》中的描述:“亲之如兄,字曰孔方。”《汉书·食货志》中有记载:“钱圆函方。”这背后,其实蕴含着一个有趣的物理现象:古代钱币的形状多呈外圆内方,即“外圆而内方”。

实际上,中国的铜钱并非一直都是外圆内方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多种形状,如刀形、裤子形和钥匙状等。然而,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币制起,方孔铜钱便开始流行,并一直沿用至1900年清朝末年,历经两千余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尽管铜钱的材质和大小有所差异,但钱币中央的四方孔眼却一直得以保留。

为何选择外圆内方呢?这背后蕴含着多方面的考量。一是铸造技术的考量。在古代,铜钱的制造通常采用熔铜铸钱的方法。这种工艺中,铜被熔化成“铜水”,随后被注入钱模中冷却成型。然而,直接铸造的铜钱边缘往往不规整,不仅影响美观,还会在使用时刮伤手部。因此工匠们把多个铸好的钱币穿在一根方形的木棍上,木棍能卡住钱币,防止它们转动。这样一来,在打磨钱币边缘的时候,就能保证每个钱币的边缘都光滑平整,大小一致。

说完“内方”,再来说说“外圆”。圆形钱币的四周没有棱角,不容易被磨损,要是做成带尖带角的形状,在日常使用和流通中,很容易磕坏碰坏,价值也就跟着受影响了。而且圆形的钱币方便携带,中间的孔可以用绳子穿起来,方便计数,这样挂在腰间或者揣在兜里,走南闯北不容易弄丢,“腰财万贯”正是由此而来。

外圆内方的形状还和古人的宇宙观有关。古人云:“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老祖宗们讲究“天圆地方”,天地合之一就是皇权的象征。把钱币造成圆形方孔,就有了一种象征意义,方孔代表中央政权,外圆象征王权统御四方,强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

此外,这和中国古代推崇的处世之道也十分契合。儒家思想中,圆形象征灵活变通,方形象征正直原则,暗合古人推崇的“外柔内刚”的理念。(据《北京青年报》)

古人的身份证

身份认证的历史,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秦国。

战国末期,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为强化人口控制,他发明了名为“照身帖”的凭证。“照身帖”是用一块竹片经打磨而成,上面刻有持帖人的头像、姓名、籍贯等信息,成为秦国人出行在外的必备之物。无此帖者即为“黑户”,行路不得出关,投店无人敢收。

然而,商鞅却被自己的这项发明所累。秦孝公死后,商鞅仓皇出逃,至函谷关时扮为商旅欲投宿。店主依律索要照身帖验明身份,商鞅竟拿不出。这枚小小竹牌,竟使一代改革家无处遁形。

至唐代,演化出等级森严的“鱼符”制度。官员品级不同,鱼符材质也不同。亲王及三品以上官员佩金鱼符,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官员使用银鱼符,六品及以下则用铜鱼符。鱼符上刻有详细的身份信息,包括官员姓名、任职部门和官位等级等。鱼符分左右两半:左符藏于禁中,右符由官员随身携带,执行公务或出入皇宫时都需要使用鱼符验明身份。

到了宋代,鱼符渐被腰牌取代。明代腰牌也叫“牙牌”,材质多样,象牙、兽骨、木材均可,且按勋戚、宗室、文臣、武将、教坊分五类标记。清人则更重防伪,腰牌除基本信息外,还须注明面部特征,如“面白无须”“左颊有痣”,这已与今日身份证的防伪思维相通。(据《团结报》)

《消夏图》中主人公手持驱蚊的棕拂子。